

温州“太学九先生”的学术及其文学创作

杨万里

内容提要 温州太学九先生追求“为己之学”，读书的目的是明道，故他们高度认同程学；又因为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春秋》学教育，博杂经史，故经术事功兼重。九先生思想依于洛学，但文学创作上没有门户之见，尊敬苏轼及其追随者，所以为文明白淳实，吐言清拔，不露伉厉之气，又娴雅有法。

关键词 太学九先生 《春秋》学 周行己 许景衡

温州“太学九先生”是指神宗元丰至哲宗元祐时，温州在太学读书的九位学生。他们是：赵霄（1062—1109，字彦昭，学正）、张焯（？—1117，字子充，学录）、周行己（1067—1124以后，字恭叔，博士）、刘安节（1067—1116，字元承，左史）、刘安上（1068—1128，字元礼，给谏）、许景衡（1072—1128，字少伊，右丞）、戴述（1074—1110，字明仲，教授）、蒋元中（生卒不详，太学）、沈彬老（生卒不详，字躬行，太学）。南宋绍兴末（1162），周和二刘已入乡祠，明弘治《温州府志》已载“元丰太学九先生”称号，而温州地志中所列之儒学、乡贤、乡祠，必自王景山、林石始，继则九先生，可知九人在温州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九先生大多出身富有之家^①，不少是当地有影响的望族，甚有累世协助地方官员操持当地事务者^②。互为婚姻者多：许景衡与赵氏兄弟是表亲关系^③；刘安上之妹嫁丁淳夫（丁昌期长子），故丁、刘二家是姻戚，且刘安节曾从学于丁昌期门下^④；许景衡家族与丁昌期家族亦是姻亲关系^⑤；沈彬老的妹妹嫁赵霄之弟赵霭^⑥；许景衡家族与沈氏家族为世亲^⑦；戴述的夫人是刘安上的妹妹，故戴述与丁淳夫是连襟^⑧。有

① 周行己《浮沚集》卷六《劝学文》：“人皆有可学之性，而或不得学者，盖由出乎贫贱之家，日迫于饘粥之不暇，所以沉为下愚，终身不灵，以貽笞戮，无所不至。此人之不幸也。诸生生于富有之家，复赖父兄之贤，使得从师为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第1123册，第649页。下引该书版本同）可以想见这是当时能求学诸子的一般情况。王宇博士论文《永嘉学术与南宋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2005年，浙江大学）第一章第二节论“游学的经济条件”已对温州太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稍作分析。

② 《浮沚集》卷七《丁世元墓志铭》：“家或饶资，必被役于公。”周氏家族与丁氏家族即长期“被役”者（第668页）。

③ 许景衡《横塘集》卷三《赵表侄出先德彦章诗卷》诗，卷一八《代家兄祭赵彦章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7册，第189页，第333页。下引该书版本同）。赵彦章或为赵霄（彦昭）兄弟行。

④ 刘安上《给事集》卷四《祭丁包蒙文》，刘安礼《刘左史集》卷二《祭丁逢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4册，第41页，第72页。下引该书版本同）。

⑤ 《横塘集》卷一八《祭丁二丈（昌期）文》（第332页）。

⑥ 《浮沚集》卷七《沈子正墓志铭》（第669—670页）。

⑦ 《横塘集》卷一八《祭家姑文》（第334页）。

⑧ 《浮沚集》卷七《戴明仲墓志铭》（第670页）。

着这层亲缘关系，加之又都离乡同游太学，故九人情谊深厚^①。无论在乡抑或在外，均互相支持，互相砥砺。这种群体意识支配着他们共同的行为，大大提升了温州太学生的社会形象，而他们一致倾向程颐之学，也多少与这种群体意识有关。

自北宋元丰二年（1079）八月作“新太学”（即扩招后的太学）^②，到元丰八年（1085）之间，太学均以新学讲授是可以断定的。元祐年间（1086—1094）情况有些变化，但《三经新义》似未废^③。元祐八年（1093）三月庚子，诏御试举人，复试赋诗论三题^④。此时苏轼任礼部尚书，想必是他建议的结果。绍圣元年（1094）五月甲辰，诗赋取士的作法又被否定，重回元丰法^⑤。九先生在太学时，先后经历了以上变化。

据今考证，周行己游太学始于元丰六年（1083），仅十七岁^⑥，元祐五年（1090）十一月从洛阳回开封^⑦，元祐六年中进士，出晁补之（无咎）之门^⑧。周行己又谓张焜“元丰太学，莫如子旧”^⑨，说明张焜是元丰时入太学的；“莫如”云云，说明其时入太学的不止周、张二人，赵霄年最长，必为元丰太学生无疑^⑩。刘安节年过二十入太学，从弟安上同游^⑪，均不在元丰时。元丰改元时许景元始读书乡校^⑫；二刘游太学时，许景衡还是诸生^⑬；戴述比许景衡小三岁，“肄业乡校，较其艺常为诸生先，因去游京师，试广文馆”^⑭。广文馆乃元祐间设立，故戴述也不是元丰时的太学生。周行己《赠沈彬老》诗云：“晚得沈夫子，学问有根柢。”^⑮很明显，沈彬老不是周氏元丰同学。因此，九先生除蒋元中不详外，只有周、

① 周行己为同游太学的几位早逝同学写过墓志，均流露出不胜悲痛之情。另如许景衡《横塘集》卷一九《蔡君济墓志铭》：“余惊咽不能语，顷之方能哭泣问故。”（第342页）蔡君济不属九先生之列，但为许景衡太学时同学。

②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太学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57页。下引该书版本同）。熙宁四年，（太学）生员厘为三等：始入学为外舍，初不限员，后定额七百人；外舍升内舍员二百；内舍升上舍员百。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内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月一私试，岁一公试，补内舍生；间岁一舍试，补上舍生，弥封誉录如贡举法；而上舍试则学官不预。上舍分三等。学正增为五人，学录增为十人，学录参以学生为之（第3660页）。此谓之新太学。元祐间置广文馆，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崇宁建辟雍于郊，以处贡生（第3657—3658页）。由州郡贡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学，皆行三舍考选法。北宋神宗以后学校建置情况大致如此。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云：“（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诏自今举人程试并许用古今诸儒之说，或出己见，勿引申、韩、释氏之书。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3722页下）《宋史·哲宗本纪》说同（第323页）。但《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哲宗元祐二年春正月戊辰”条，此语后接着有“毋得专取王氏说”一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53册，第241页）。“不专取王氏”，表明王氏新说并未完全废除，此时《三经新义》尚行于三舍及科举。

④ 《宋史·哲宗本纪》（第336页）。

⑤ 《宋史·哲宗本纪》（第340页）。

⑥ 《浮沚集》卷四《送刘絜矩序》（第635页）；卷七《祭刘絜矩文》（第662页）。又，卷五《上祭酒书》自言十七岁游太学（第644页）。

⑦ 《浮沚集》卷七《邓子同墓志铭》（第673页）。

⑧ 《浮沚集》卷四《晁元升集序》（第633页）。

⑨ 《浮沚集》卷七《祭张子充文》（第663页）。另，刘安节《宋国宝墓志铭》中亦说张焜为安节所敬，则焜辈分稍长（《刘左史集》卷二，第70页）。

⑩ 赵霄与许景衡的兄长许景亮从小一起游戏，兴趣相同，年龄相近。见《横塘集》卷一八《代家兄祭赵彦章文》（第333页）。许景亮熙宁末游太学，则赵游太学必在元丰时。这与九先生中赵霄“年最长”的记载也是符合的。

⑪ 许景衡《刘安节墓志》，《刘左史集》附（第108—111页）。按：此文不见于许景衡《横塘集》。

⑫ 《横塘集》卷一八《送徐长世序》：“元丰改元，予始总发，授书乡校。”（第324页）

⑬ 《横塘集》卷一八《祭宣州刘舍人文》：“公游太学，我亦诸生。”（第331页）

⑭ 《浮沚集》卷七《戴明仲墓志铭》（第670页）。

⑮ 《浮沚集》卷八（第677页）。

赵、张三人是元丰太学生，二刘、许、戴、沈均是元祐太学生^①。

二

无论是元丰时的太学，还是元祐时的太学，温州出来的学生都不适应。因为此时的太学本质上已沦为考进士的场所，侧重在程式训练，其特点是摭拾前人成文，拼凑成章以应试。连新太学的创始人王安石都深感失望^②。九先生在去太学前，已在乡间接受了良好的经学教育^③，追求“为己之学”^④，读书的目的是明道，求得普遍真理。他们屡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士也贵尚志，古道自足师，不必令人贵。”“读书要知道，文章实小技。”^⑤“(赵霄)选为济州州学教授，导学者以笃学力行，不专务科举。”^⑥“(戴述)以为太学士皆科举口耳之学为未至，于是益游四方，求古所谓为己之学。”^⑦“(丁志夫)初从进士举，方尚辞赋，或劝其从时好，曰经术吾家学也，舍之而从彼，何哉？”^⑧例子举不胜举。在温州太学生中“学以明道”的看法具有普遍性，这与他们在乡里所受的教育有关，如他们的老师之一林石就是奉为己之学的^⑨。

温州的九位太学生都倾向于程氏学，并将其传入温州。九先生中亲炙程氏者，有文献可征的至少有周、二刘、戴^⑩、沈^⑪五人，其他人则只能算是私淑^⑫。但是，从南宋中期起，文献记载都将太学九先生片面化了，认为九先生的学术，除了得自程氏外无他。要知道，程学在当时也只是众多新学中的一种，

① “元丰太学九先生”一词，首见于弘治《温州府志》（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5页），很不严谨。宋人无此称谓。今后宜改称“太学九先生”为确。

②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六：“公（指王安石）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正如学究诵注疏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9册，第207页）在集权体制下，应试教育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因为这种体制限定了“人才”的范围和选择方法。以昔观今，今犹昔也。

③ 刘安节在《为林思廉祭林介夫》文中说：“一时诸公，舍己请从……海我谕我，谓我宗盟……先生之教，夫敢不力，尚期终身，佩服不遗。”“一时诸公”云云，指包括太学九先生在内的当地诸生（《刘左史集》卷二，第73页）。

④ 《浮沚集》卷六《从弟成己审己直己存己用己字说》：“尔亦闻有所谓君子之学乎？夫古之君子为己而学。……何谓为己之学？以吾有孝悌也则学，以吾有忠信也则学，学乎内者也，养其德者也。”（第649—652页）

⑤ 《浮沚集》卷八《赠沈彬老》（第677页）。

⑥ 《浮沚集》卷七《赵彦昭墓志铭》（第664—665页）。

⑦ 《浮沚集》卷七《戴明仲墓志铭》（第670—672页）。

⑧ 《横塘集》卷一九《丁大夫墓志铭》（第335—337页）。

⑨ 刘安节曾转述过林石对求学的看法：“大道之行，维国求贤。往往其君，拥彗以先。后世多私，维贤求国。俯首有司，以幸一得。伟哉先生，则异于是。曰予之学，初不为利。胡为去亲，千里决科。丐禄升斗，其获几何？出耕东皋，入奉北堂。夫岂无他，而行一乡。”（《刘左史集》卷二《为林思廉祭林介夫》，第73页）

⑩ 《伊洛渊源录》出自朱熹之手，容或有漏载之处，典型的例子就是戴述。他的同学周行己在其墓铭中说得很清楚，戴述曾从程氏游（《浮沚集》卷七《戴明仲墓志铭》，第670—672页）。墓志是极郑重的文体，周氏不会无中生有。

⑪ 《叶适集》卷一七《沈仲一墓志铭》：“沈君名体仁，字仲一……有彬老者，北游程氏，师生间得性命微旨，经世大意。方禁《春秋》学，石经甫刻即废，彬老窃赂守者，自摹藏之。”（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5页）

⑫ 元祐中，鲍若雨（商霖）携同郡谢佃、潘旻、陈经正、陈经邦、陈经德、陈经郭不远千里，从温州赶赴洛阳，从程氏学。经开封，许景衡写诗送行，并代问已在洛阳的周行己：“我欲收心求克己，公知诚意在闲邪。汝南夫子规模大，归去相从海一涯。”（《横塘集》卷五《送商霖兼简共（恭）叔》，第211页）程颐曾官汝南，故有“汝南夫子”之称。许氏表达了对程学的认同和向往，但他没有去洛阳亲炙程氏。陈傅良《重修瑞安学记》说许景衡、沈躬行曾“偕同郡诸儒，又尝越数千里外，窃从程（颐）、吕（大临）二氏问学”，恐是笼统的臆说，并无事实依据。弘治《温州府志》卷一〇甚至说：“时新学行，（周行己）独之洛从伊川。二刘、许、赵继至，皆敬下之。”（第234页）继至的恐是鲍若雨等一行人，非许、赵。再说，他们不可能在洛阳同时受程氏学和吕氏学。

九先生虽然认同他，但不是没有自己的思想。温州乡先生培养出来的学生，奉为己之学，故求学重在征道明理；又能博杂经史，尤深于《春秋》，故经术事功兼重。九先生的老师林石，他的两位重要讲友管师常和龚原都负经世之学，且林氏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都送到东京从龚原学，说明林石是经术和致用并重的^①。因此，检视“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应该深入考量伴随他们成长的三重文化背景：地方民众信仰传统（崇佛道），从乡先生们所受的《春秋》学教育，京洛师友所习。前两者可视为地方小传统，后者可视为大传统。九先生依于洛学而不同于洛学的独特面貌也因此而呈现。

周行己在《上祭酒书》中说，太学六年，其读书观念出现三次根本性转变^②。这种频繁的剧变超出常情，很令人生疑。这次上书不排除他有意向太学博士吕大临示亲近的成分，不能据之定论。事实上，周行己自小体弱多病，对存心养性之说较偏好，于周、孔、老、佛无所不求^③，其阅读旨趣与洛学反感佛老明显不同^④。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周行己的哲学思想，集中于《浮沚集》卷二“经解”和卷四《论语序》等文^⑤；而其政治思想则集中体现在卷一《上皇帝书》（二）。先引“经解”试为分析。

万物皆有太极，太极者道之大本；万物皆有两仪，两仪者道之大用。无一则不立，无两则不成。

太极即两以成体，两仪即一以成用。故在太极不谓之先，为两仪不谓之后。^⑥

“太极”被视为逻辑的绝对起点，“本”、“用”乃同一事物的两面。这种辩思思维本非儒家所有，是洛学从老庄、佛教那儿借来的。显然，在周氏那里，“本”和“用”两者还是一体的，不分先后。刘安节也持道与物（器）不分的观点^⑦，而与洛学“道本器末”拉开了距离。

濂洛之学将“太极”、“体”、“用”等辩证思维引入儒学后，儒家学说较之以前便走上了圆融通达之路，如孟子的话“岂道之远人哉”，经过洛学学者的一番术语包装后，发挥成日常生活即是道。一下子将儒学与普通百姓的阻隔扫空了，人人都可成圣成贤成君子^⑧。这种思想为太学九先生们所接受，并成为后来永嘉学派的学术精神的重要特征：

至于天下之民，目视耳听、手举足运无非道者。朝作暮息、渴饮饥食无非道者。然而察其声音铏铏，目视眴眴，有生而已，终身由是，曾不知洒扫应对之妙道，而耕稼陶渔之可以圣也。是岂道之远人哉！^⑨

成为“君子”并非无标准可循：

夫所谓君子之道，中而已矣。或偏于仁，或偏于知，过乎中者也。日用而不知，不及乎中者也。

太极即中也。中即性也。^⑩

亲仁、尚智者是“过于中”，对日常生活麻木不仁者是“不及于中”，他们都不是君子。且不谈其理论的合理性如何，但将君子之道与中、性、太极之类概念联系起来，富于哲学味道，不能不说是洛学的

① 见笔者《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刊《清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2期。

② 《浮沚集》卷五（第644—645页）。

③ 《浮沚集》卷五《上宰相书》（第642—643页）。

④ 韩淲《涧泉日记》卷下：“周恭叔行己，文字温淡，但时有庄老，与程氏说相背。诗亦好。”

⑤ 周梦江先生指出，《浮沚集》中《礼记讲义序》、《易讲义序》两文是程颐所作，周氏拿来作讲义，后人编集时混为周文了（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论周行己》）。

⑥ 《浮沚集》卷二“经解”（第610页）。

⑦ 刘安节《行于万物者道》：“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运乎物者也。明乎此，则庄周之论得矣。”（《刘左史集》卷三，第93页）

⑧ 这种思维取向，显然受佛教“立地成佛”、“方便之门”的影响。

⑨ 《浮沚集》卷二“经解”（第611页）。又参《浮沚集》卷四《送何进儒序》：“圣人之学，自洒扫应对以至入孝出悌，循循有序，故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后世学者大言阔论，往往以孝悌为君子易行之事，若不足学。而以道德性命之说增饰高妙，自置其身于尧舜之上。退而视其闺门之行，有悖德者多矣。若人者，其自欺者欤？”（第637页）

⑩ 《浮沚集》卷二“经解”（第611页）。

创造。具体来说,成为君子还得从“持敬”、“无我”、“无物”、“不可满志”、“不可极乐”几方面去修炼^①。周行己大体上能准确传达洛学精髓。九先生中的其他人,在继承和传播洛学精神方面,情况大多类此,如《二程全书》第十八卷皆刘安节所录,凡二百五十余条;许景衡的教育思想也可看出他对洛学有着高度的认同^②。而后世对九先生的评价,也基本上着眼于他们传播洛学之功,并且强化了这一点,而于周、二刘关键处露出自家面貌(如本和用的关系、道和物的关系)则视而不见。

以九先生现存的传世文集来分析,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比这要丰富得多,其广博深厚的经世致用思想更值得大书特书。如周行己在《上皇帝书》(二)中提出:

守位莫大于得人心,聚人莫先于经国用。得人心之说有四:一曰广恩宥,二曰解朋党,三曰用有德,四曰重守令;经国用之说有六:一曰修钱货之法,二曰修茶盐之法,三曰修居养安济漏泽之法,四曰修学校之法,五曰修吏役之法,六曰修转输之法。^③(该文较长,此辑录要点)

守位,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如何使政府的管理职能有效运转;聚人,就是依靠人才治国。周行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经济基础,人才是不可能“聚起来”的。于是,如何“经国用”(发展经济)便成为重中之重。“经国用”六策中,修钱货之法颇具“现代金融”的理念,其核心观念是:建立全国的货币信用体系,以应付当时复杂的金融问题,如铜钱外流、货币币值混乱、盗铸风行、流通受阻等等。《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用专节来阐述他的货币思想,并给予极高评价^④。周氏将修钱货之法放在“经国用”六法之首,表明他非常清楚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有这种超前意识的人,决非正宗洛学社里人。其他如修茶盐之法、修学校之法,均能切合实际^⑤,且便于操作。像周行己这样在政治上系统而专业地提出见解的,此前似只有王安石可与之相比。“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梁启超评价王安石的话^⑥,在周行己身上也可找到相似之处。“正宗”理学传人对周行己学术的“不纯”素有微词^⑦,其实这些“不纯”之处,恰好体现了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温州太学生们学术思想的闪光之处。很明显,在太学九先生身上,蕴藏着两条学术路线的可能:一是洛学温州支派^⑧,是显流;二是经世之学(狭义的),是潜流。经过高宗前期的一段文化低潮后,到高宗后期,前者被郑伯熊兄弟继承并发扬,

① 《浮沚集》卷二“经解”(第611—614页)。类似的意思他在《储端中字序》中也表示过:“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明,然后知道之为道也;诚,然后知道之为道也。由公之学以达公之明,以达公之诚,其有不至于道者哉。古之圣人,皆由乎道,舍是其无适矣。宣和四年九月一日。”(《浮沚集》卷四,第635页)许景衡《刘安节墓志》:“公清明坦夷,雅近于道。尝从当世先生长者问学。始以致知格物发其材,久之存心养性。”刘安上《祭亡兄左史文》:“载念西游,担簦于洛。依归夫子,覃思力学。格物致知,会方守约。”(《给事集》卷四,第41页)

② 《横塘集》卷一八《温州瑞安迁县学碑》:“其学维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诚,物我为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亲亲长长,而天下平。秦汉以来,治功蔑然。学校弗修,斯道弗传。明明天子,千载有作。稽古圣谟,以觉后觉。”(第327—328页)

③ 《浮沚集》卷一《上皇帝书》(二)(第602—608页)。

④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第五十章第二节“周行己的货币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281页)。

⑤ 刘安节《州郡立学皆置学官》:“况乎四方之士远京师者,或数千里,终岁聚粮尚惧不继,则虽有贤如原宪者,切恐不能自致于太学矣。故为今之计者,莫若推三舍之法,以行于天下。使近者不得抱羁旅之戚,而远者亦得承诱掖之化。”(《刘左史集》卷四,第99—100页)

⑥ 梁启超《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04页)。

⑦ 《伊洛渊源录》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48册,第526页)。另见前引《涧泉日记》卷下语。

⑧ 洛学温州支派由在太学读过书的温籍士子们共同创立,但主要以九先生的影响为主(毕竟功名仕宦摆在那儿),但其他人也有相当的贡献,如蔡君济,所学“以正心诚意为本,其优游涵养,日趋于自得。邹志完、陈莹中、杨中立、周恭叔尤所钦爱,皆许以有用于世。邹、陈久于谪籍,君济从之,不远千里。志完疾病,以书招之,比君济至,病且革矣,尽吐生平所欲言者,而性命之理,死生之说,见于《问答》云。”(《横塘集》卷一九《蔡君济墓志铭》,第343页)这些人都是洛学的重要传承人。

最终融入朱氏学中；后者被薛季宣继承和发扬，终成经制之学，是为永嘉学术（狭义的）形成的标志，也标志着温州地域文化走向成熟。

三

北宋后期，在外来作家的号召带动下，温州地域文学创作曾出现一个小高潮。神宗元丰初（1078），一代名臣赵抃致仕，其子赵岷时为温州郡丞，筑戏彩堂以养老，而郡守石牧之（继任者李钧）、县令朱著、当地名宿林石等，皆好文之士，互相唱和，前后长达三四年。他们一起游山玩水，所至唱和，结成《永嘉唱和》^①。这些唱和诗还有几首保留在弘治《温州府志》卷二二“词翰四”里。这些诗还传到了京城并引起人们注意^②，此事对当地文学界的冲击也是不难想象的，正值青少年时期的太学九先生们，对此应该也有深刻印象。多年后，许景衡在《上石守》中对此深情回忆^③：

某窃以永嘉名郡，江山秀发，甲于东南。自昔颜、谢相继出守，率以登临吟咏为事。考之载籍，则晋宋风流多出于此。陈迹依然，不知几寒暑寥寥，后来谁复继之？比何幸，乃有大君子来此。恩威所临，歌颂载路。又得以诗酒行乐，览古诏今，江山自是增气矣。乃者窃观酬唱篇轴，辞严义丰，远追前人，殆非庸庸刻琢者所敢窥寻其仿佛也。

许景衡提到的这些“酬唱篇轴”就是二十卷《永嘉唱和》诗。“江山自是增气”，说明这次文学酬唱活动大大提振了当地文化自觉意识，故人们将这一次文学唱和与历史上谢灵运在永嘉的文学创作相提并论^④。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外来文人带着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里的山山水水，并带头进行山水诗的写作。以上是太学九先生们成长的文学背景之一。

太学九先生中，四人文集有传：周行己《浮沚集》八卷，刘安节《刘左史集》四卷，刘安上《给事集》五卷，许景衡《横塘集》二十卷。据弘治《温州府志》卷二七“经籍·集部”，当时师友文集还有：仰忻《永嘉百题诗集》，林石《三游集》、《塘奥集》，鲍若雨《敬亭文集》，戴述《归去来集》，戴述、戴迅《二戴集》，萧振《萧德起文集》等。又据《横塘集》卷三《赵表侄出先德彦章诗卷》，可知赵霄也有诗集留世。文献的存留很不容易，太多的偶然因素在起作用，现存作品，也只是当时极小的一部分，如刘安上本有诗五百篇，制诰杂文三十卷^⑤，今传《给事集》才区区五卷。

在“四海文章尽苏氏”的北宋后期^⑥，高度认可洛学的太学九先生，其文学创作有何特色？换句话说：在理学初传时文学出现了什么样的新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① 苏颂《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在温州）治办益无事，间或会宾僚，追文酒之乐，继以酬唱篇咏，不日盈编轴。好事者集成二十卷，目曰《永嘉唱和》云。罢郡时，年才六十六。”（《苏魏公文集》卷五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2册，第590页）按苏文，石牧之元祐八年冬十一月卒，年七十九，则知其生于公元1015年。六十六岁罢温州郡政，事在元丰四年（1081）。

② 陈傅良《新归墓表》：“当世以赵清献公与其子岷景仁所遗诗，次其岁月，则先生名动京师矣。”（《止斋先生文集》卷四八，上海书店《丛书集成续编》本，第104册，第964页）苏辙《栾城集》卷一一有《寄题赵承事岷戏彩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可证此事不虚。林石、赵抃父子三人唱和诗集或为《三游集》，见弘治《温州府志》卷二七“经籍·集部”。

③ 《横塘集》卷一六（第314页）。按：石牧之罢温州郡政时，许景衡不足十岁，不可能有“上石守文”。此殆后来所作，献给致仕后的石牧之的。石牧之在温州罢政后致仕，故仍以旧称“石守”呼之。

④ 赵抃的到来对当地文化的冲击，还表现在当地人为他建祠上。周行己崇宁三年六月所作《瑞安县陶隐居丹室记》云：“（佛寺）今其像绘赵清献公……乡民祝而尸之，方且舞倡优而荐荤膻。”此文载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词翰一”，可为《浮沚集》补遗。

⑤ 薛嘉言《刘安上行状》，《给事集》卷五附（第50—54页）。

⑥ 《浮沚集》卷八《送欧阳司理归荆南》（第684页）。

自韩愈以来,儒学内涵已逐渐转换成中晚唐“新儒学”——道,道与文学的关系,成了文学家创作时需要审视的问题之一。所以,古老的“文以载道”创作理念,至此又开新境。文学被告之要承担文化复兴、人格力量、历史道义、政治辩护等重大责任,文风盛衰与政教兴废的关联被强调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代表着中唐至北宋文学主潮的“古文运动”因此而发展起来。程氏理学是中唐以来“新儒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相应地,唐宋古文运动也进入到了理学与文学“共生”的阶段。温州太学九先生是二程理学及吕氏关学的第一代传人,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为我们考察理学与文学“联姻”的最初状态,提供了较好范例。

文学的内容上,太学九先生们依据程洛学术理念,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周行己称自己进太学后的第四年“读书益见道理,于是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乃知文人才士不足尚”^①。“德先艺后”是他们的共识,“道学”成了他们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东西^②,用四库馆臣的话说就是“粹然为儒者之言”^③。“经解”、讲义、谈理论性等内容在文集中越来越常见。

文风上,今存周、许、二刘文集都体现出“明白淳实”、“娴雅有法”、“明白质实”(均四库馆臣评语)等特征。这与理学家追求“君子之道,中而已”的根本要求分不开。《浮沚集》卷四的几篇序和记最能体现这个特征,如卷四《送何进孺序》,首明宗旨“尧舜之道孝悌而矣已,唯曾子得之”,接批现实中士大夫以大言饰非,自然地引出何进孺致政回乡侍亲之事,赞之为行曾子之孝道。全篇以儒家孝道为中心展开,语气平和,雅洁古淡,一派儒者风貌。又如五言诗《送友人东归》:

是身如聚沫,如烛亦如风。奔走天地内,苦为万虑攻。陈子得先觉,水镜当胸中。异乡各为客,相看如秋鸿。扁舟忽归去,宛然此道东。我亦拟远适,西入华与嵩。饮水有余乐,避烦甘百穷。相逢不可期,偶然如飘蓬。于道各努力,千里自同风。^④

此诗作于他在太学赴洛阳从程颐问学的前夕。平平的说理,淡淡的感慨,浅浅的离愁。没有激烈的情绪,没有跳跃的思绪,没有古奥的语言,娴雅之至,一种清澈纯净之美。

四库馆臣论《浮沚集》说:“行己之学,虽出程氏,而与曾巩、黄庭坚、晁说之、秦觏、李之仪、左誉诸人皆相倡和。集中《寄鲁直学士》一诗称:‘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于苏轼亦极倾倒,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故耳濡目染,诗文亦皆娴雅有法,尤讲学家所难能矣。”^⑤其实,这也是温州太学九先生们的共同特征:学出程颐而文尚苏轼一派。可依馆臣评论作进一步的探讨。

周行己敬慕苏轼,有文献可征^⑥。周行己在《晁元升集序》中说:“元祐丁卯(1087),行己与王玉璫同在太学,每见文玉诵元升‘安得龙山潮,驾回马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之句,每想其高趣,恨不得即见。”^⑦早年周氏所激赏的作品,风情摇曳,神思飞度。这与他在《上祭酒书》中的自述是一致的:入太学两年后转学古文(1085—1087),“上希屈宋,下法韩柳”,“恃文为非诮,凭文以戏谑,自谓吾徒为神仙中人”^⑧。其时所学古文,实际上是非常接近苏轼早期汪洋恣肆的文风。然而,

① 《浮沚集》卷五《上祭酒书》(第644页)。

② 《横塘集》卷一八《祭蔡济仲文》、《祭宣州刘舍人文》、《祭王义夫文》等,都表达了温州士子们对“道学”的共同追求。

③ 《浮沚集》提要:“(周文)粹然为儒者之言”;《横塘集》提要:“(许文)粹然一出于正”;《刘左史集》提要:“不失为儒者之言”;《给事集》提要:“文笔亦修洁自好”。

④ 《浮沚集》卷八(第680页)。

⑤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41页)。

⑥ 除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外,周行己《送毕之进状元》(二首之二)有句云:“平生苏惠州,气概颇自许。人生艰难际,政可观去处。”毕渐以东坡气节自许,而作者以赞赏的口气写出,正表明了周氏对苏东坡的敬仰。

⑦ 《浮沚集》卷四(第633页)。

⑧ 《浮沚集》卷五(第644—645页)。

爱好与实际创作是有距离的,周氏虽慕苏轼文风,但其才力不足以驰骋恣肆。

许景衡与周行己、刘安上一样,对苏轼及其追随者皆敬慕友好^①。《横塘集》卷三有《闻子瞻南迁》诗,有“遂作天涯客,何如塞上翁。幽愁还有作,笑杀赞皇公”等句,将苏轼比作唐代世人皆尊的名臣李栖筠(李吉甫之父)。许景衡对苏轼的敬慕,不下于周行己。

大约自绍圣时期开始,程颐的能诗弟子与苏、黄的弟子(包括再传弟子)走向了融汇:他们理学宗程颐,诗学宗黄、陈,而以杜甫为旗帜,江西诗派由此而逐渐成形。这是宋代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重大变化时期。台州左纬(经臣)便是这种融合时期出现的著名诗人。

左纬在政、宣时期诗名甚盛,周行己、刘安节、刘安上、许景衡皆兄事之,与之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左经臣有诗集名《委羽居士集》,黄裳序之曰:“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诗自适。慕王维、杜甫之遗风,甚严而有法。自言每以意、理、趣观古今诗,莫能出此三字。”^②在两宋之交,当时论诗者已敏锐地感觉到了理学给诗歌创作带来的审美变化。左经臣明确是以杜甫为诗学榜样的,而主张作诗要以“意、理、趣”为标准,深得宋诗独特的审美意蕴。许景衡论诗,往往以杜甫为典范^③,如评左纬诗:“泰山孙伯野尝见经臣《避寇》古律诗,击节称叹,曰此非今人之诗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别。余谓非《避寇》诸诗为然,大抵句法皆与少陵抗衡,如《会侄》一大篇,自天宝以后,不闻此作矣。”^④他也模仿着写类似的诗,如《东郊》状农民遇旱灾后的困苦(《横塘集》卷二),有点杜甫诗的影子。宋代温州地域文学之起,受外来文人及旁郡文人创作的带动,这也说明了文化交流对一地文学崛起的重要作用。

四

概而言之,检视九先生的文学创作,应从三个角度来考量:理学传人的身份,文学交流与诗友切磋、地方文化传统对创作主体思维方式的影响(山水诗传统和崇信佛道)。前两者对九先生文学创作的影响已分析如上,可补论者尚有地方文化传统对九先生创作的影响。

在温州,文学界的崇古思潮有深厚的民众基础。赵彦章的岳父鲍某先生,有感于“李杜不作,儿曹乱真。斗靡俪华,泯泯纷纷”的诗界现状,锐意学古,其诗“浑然天成,近体古风,琅琅厥声”^⑤。当地佛教徒佛月大师,作诗“又能作古体,淡淡造静理”^⑥。这种文学传统和理学思想相结合,九先生文风的基调由此而奠定,正如薛嘉言为刘安上作《行状》所称:“公为文,典重有法……晚更平淡,浑然天成,无斧斤迹。”^⑦《四库全书总目》评《横塘集》说:“至其诗篇,乃吐言清拔,不露伉厉之气。”^⑧扩大来看,这也可视作当时温州太学九先生文学的共同特点。

同时,温州当地浓厚的佛道氛围也对他们的创作有一定影响。周氏退居在家后,以“浮沚”名居,又以名集。对这个词的偏爱,或许可以用来分析其精神世界,不妨来看看他的《浮沚记》^⑨:

① 周行己在太学的好友,如崔鹗、李廌,皆苏轼弟子(《浮沚集》卷四《送刘絜矩序》,第635页);而苏轼弟子晁补之(无咎)则是许景衡的座师(《横塘集》卷一六《与晁无咎》,第307—308页)。

② 黄裳《委羽居士集序》(林氏表编《赤城集》卷一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56册,第763—764页)。

③ 《横塘集》卷二《次韵郑希仲》:“周诗三百篇,强半出愤激。少陵嗣真作,千载无匹敌。”(第173页)

④ 黄裳《委羽居士集序》后许景衡跋(第764页)。

⑤ 《横塘集》卷一八《代赵彦章祭鲍丈文》(第332—333页)。

⑥ 《浮沚集》卷五《与佛月大师书》(第645页)。

⑦ 《给事集》卷五附(第54页)。

⑧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九”(第1345页)。

⑨ 此文载弘治《温州府志》卷一九“词翰一”,不见于《浮沚集》,可据补。

予浮云其仕，泛然出，油然归。有名无位，凡民如也。有乡无居，逆旅如也。僦室净光山之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藁然小洲，缭以沟水。予视吾生若沤，起灭不常。吾视吾身若萍，去留无止。以吾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聚沫也，尘垢也，蝉蜕也，刍狗也，于吾何有哉？政和岁在执徐，六月癸丑，飓风大作，桥断门隳，檐折雨漫，乃易桥以舟，堦北户面南向，增檐为轩，寄容足之苟安。按《尔雅》，水中可居曰洲，其小者曰沚，人所为曰渚。予恶渚之名而欣沚之义，于是，总其名曰浮沚……故吾不独浮其仕，又且浮其居；不独浮其居，又且浮其生，然则，有之而何得？无之而何失？如此而仕，吾故安于仕也。如此而居，吾故安于居也。如此而生，吾故安于生也。吾闻古之有道者贫而乐，穷而通，岂谓是欤？非曰能之，愿学焉。记以自警。

这绝对不是洛学所能规范的思想。文字之中，浸透着佛家人生如幻的洒脱和庄子超然物外的飘逸。这也难怪，周行己自小于周、孔、老、佛无所不求（《上宰相书》），加之生活在佛道氛围极浓厚的地方（他与林灵素是同乡同时人），强大的地方文化传统伴随着他的成长。他的家族与佛教有关很深厚的关系，他本人也与佛教徒多有往来，形诸文字，俱见于《浮沚集》中。他的妹妹出家为尼，法号悦师，卒后行己曾撰文祭之。周家乃当地望族，其子弟出家非为贫困，主要出于信仰^①。总之，周行己政治思想上的经世致用和哲学思想上的佛道因素，使他与正宗的洛学传人拉开了距离。因其思想依于洛学，故其为文“粹然为儒者之言”；因其在尚佛道的环境中成长，其思想有超越的一面，故其为文娴雅旷达。

又如许景衡《晚行》诗：

脉脉多愁思，栖栖复晚行。路回村更远，林邃客频惊。宿鸟非无处，归云自有情。乡关怅何许，天际暮山横。^②

诗情低徊往复，无激烈、哀感之绪，得性情之正；又以景语抒情，含蓄不尽。台州诗友将他比作唐代的郑虔、张籍，许氏作诗回谢默认了^③。刘安上诗风亦如是，四库馆臣评《给事集》中的诗歌“格意在中晚唐间，颇见风致”^④。这种“风致”，就体现了地方佛道文化对他们创作的潜在影响。

此时的温州地域文学远未能形成自家面目，还处于步趋阶段。南宋乾淳以后，以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制举文和“四灵”诗为标志的温州地域文学，在当时文坛大放异彩，这些乡前辈播下的文学火种是不应被忽略的。

[作者简介]杨万里，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发表过专著《宋词与宋代的城市生活》等。

① 类似的情况在温州当地很多，周行己曾提及朱氏家族有男子七人，三子习进士，二子从释氏。女子一人为尼，名戒学（见《浮沚集》卷七《朱君夫人陈氏墓志铭》，第672—673页）。可以想见佛道文化对当地影响有多深重。

② 《横塘集》卷三（第181页）。

③ 《横塘集》卷五《左崇见寄以郑虔张籍见况》（第203页）。

④ 《四库全书总目》“集部·别集类八”（第1341页）。